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简明读本



主编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编写组 编著

MAKESIZHUYIZHONGGUOHUADELISHIJINCHENG
HEJIBENJINGYANJIANMINGDUBE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简明读本



主编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编写组 编著

MAKESIZHUYIZHONGGUOHUADELISHIJINCHENG
HEJIBENJINGYANJIANMINGDUBE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 /
石仲泉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
验简明读本》编写组编著.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300 - 0303 - 9

I. ①马… II. ①石… ②马… III. ①马克思主义—
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8910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DE LISHI JINCHENG

HE JIBEN JINGYAN JIANMING DUBEN

主编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简明读本》编写组 编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北京华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4.75 印张 238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0-0303-9/D · 4

定价：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专家评论

这部著作具有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学术研究与政治总结相统一的鲜明特点，既坚持了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意，又在总结党80多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有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原校长 李君如

这部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相关文献和著作为依据，从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发展相结合的角度，经过深入地研究，很好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这一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许志功

这部著作历史划分科学合理，文献资料丰富翔实，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是近年来少见的理论精品，是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成功之作。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赵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专家评论

这是一部有特色、高水平的专著，凭借独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夹叙夹议地重点突出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全过程，并认真地总结了这个过程的基本经验。全书叙得全面而条理清晰，议得简洁而分析深刻，读后使人收获甚多。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静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一书，深入而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这就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帮助人们解疑释惑。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 徐崇温

这部专著详尽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了基础性、综合性的研究，从谋篇布局、理论观点到写作方法等方面新意迭见，在目前看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中，是一部奠基之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 邵维正

项目统筹：汪劲莲 刘 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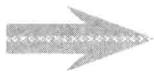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汪劲莲 刘 迪

责任印制：宋 超

封面设计：◎ 大象設計 · 郭士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版

开篇的话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为此，提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其首要任务。这是一个重要战略决策。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历经近90个春秋，跌宕峰回，波澜壮阔，但贯穿其间的主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党之魂、国之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中华民族在21世纪和今后更长时间内的安身立命之本。

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观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变化，不断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先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反复探索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是邓小平，接着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在总结国内国际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进一步结合起来，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根据日新月异的时事变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来审视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科学回答时代课题，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用简明质朴的语言把理论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观点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成为更好地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割裂的统一整体。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三者并提，并不意味着三者是并列关系。在三者中，中国化是核心，也是基础

和前提。中国化不仅仅是民族化，它蕴涵有时代化、大众化的要素。此前，学界曾认为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方面，目前根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突出时代化、大众化，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重新界定。因此，从学术层面讲民族化和当代化，与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行不悖。也可以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对此前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的进一步提升。

有鉴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以2009年9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为基础，取其精华，进一步凝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认识，来宣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思想，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这一战略任务尽绵薄之力。



目 录

开篇的话 / 1

绪 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 1

- (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及其民族性和时代性要求 / 1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 / 3
-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重新广泛使用 / 7
- (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8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 / 13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 / 13

- (一)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13
- (二)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 16
- (三) 革命阶段思想的提出和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 17

二、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及其理论的形成 / 21

- (一)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的明确 / 21
- (二) 大革命高潮兴起后国民革命思想的推进 / 23
- (三) 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端和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 28
- (四)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成熟 / 31

三、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 35
(一) 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 35
(二) 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 40
(三) 建设一个马克思化的群众性政党 / 46
四、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 54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 54
(二)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59
(三) 党的七大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 62
(四) 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 66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 / 72

五、新民主主义建设思想的发展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 / 72
(一) 《共同纲领》的建国构想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 / 72
(二)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77
(三) 社会主义改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 81
六、“第二次结合”任务的提出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 84
(一) 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二次结合”思想 / 84
(二) 党的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的可贵探索 / 86
(三)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建构 / 92
七、在初步纠“左”和全面调整中端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方向 / 95
(一)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与初步反思 / 95
(二) 全面调整时期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 100
(三) 探索执政党建设的不懈努力 / 104
(四) 指导思想的两种发展趋向 / 106
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迷误和回归马克思主义正确趋向的巨大努力 / 110
(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背离 / 110
(二) 坚持回归马克思主义正确趋向的不懈努力 / 114

- (三)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117
- (四) 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第二次飞跃”的酝酿 / 122

-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 / 125**
- 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 / 125
 - (一) 党的指导方针的历史性转变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辟 / 125
 - (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完成 / 127
 - (三) 改革开放的启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 / 132
 - (四) 经济体制改革纲领的制定与对社会主义传统认识的突破 / 135
- 十、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 137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 138
 - (二)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新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 / 142
 - (三) 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一国两制”构想 / 147
 - (四)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 / 151
 - (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 153
- 十一、改革开放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155
 - (一)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 / 155
 - (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的提出 / 159
 - (三) 跨世纪发展战略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的发展 / 162
 - (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 166
- 十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 169
 - (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 169
 - (二)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 / 172
 - (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 / 175
 - (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倡导建立和谐世界的理论 / 177
- 十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创

新 / 180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 / 180
- (二) 改革开放 30 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 / 182
- (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战略任务的提出 / 185

第四编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 188

十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 189

- (一)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 189
- (二) 真正地了解中国客观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 / 194
- (三) 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 / 198
- (四) 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 203
- (五) 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改造中国 / 208

十五、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212

- (一) 党的伟大奋斗目标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的辩证科学理解 / 212
- (二)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215

后记 / 219

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后记 / 221



绪 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思想学说。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透彻说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因为它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一方面，它研究、继承和改造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学说，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革命，是近现代世界文明的伟大思想成果；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能随着实践、科学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创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为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这里，先概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及其民族性和时代性要求

马克思主义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是以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主要标志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将他们的全部智慧和心血，献给了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

从理论创造活动看，马克思恩格斯有两个最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前者意味着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后者意味着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这两大发现，不仅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成科学，而且奠定了他们全部理论的基

础。他们一生的著述很多，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被称之为“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剩余价值学说被称之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三是为使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的阶级斗争学说，即作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写道：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是以唯物辩证法作基础建构起来的，他们的思想理论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因此，恩格斯不断强调，尽管他们的理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同任何时代的理论思维一样，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的理论的正确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既不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也不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恩格斯反复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强调作为他们的理论的哲学基础的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也强调他们的思想理论的相对性、发展性，那么，应当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呢？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要借助于唯物辩证法这个认识问题的根本方法。根据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包含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原本形态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既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加以继承的共性或普遍性的内容，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基本原理”的东西；也有属于他们理论个性的特质形态，这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特点和民族发展状况的那些具有特殊性的东西，因而为后来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加以改变的那些理论观点。所谓“民族化和当代化”，即民族性和时代性，从哲学上说，就是属于唯物辩证法的个性或特殊性这一方面。

应当说明的是，在哲学意义上讲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

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区别，而是绝对与相对的区别；而这个区别本身又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何况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在此为共性者，在彼可能为个性也。再则，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脱离个性而孤立存在的共性，共性始终是寓于个性之中的。就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辩证法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作这样的解剖，将他们的理论观点区分为共性和个性两个部分，而实际上是融为一体了，或者说，属于共性的那些内容，是寓于属于个性的、带有马克思恩格斯特质的形态之中的。这里将两者加以区分的说法，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进行反思所作的纯理论的抽象分析。就目前区分为共性和个性化的东西来说，也是相对的，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析，若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就主要是将上面讲的共性、普遍性的那些属于“基本原理”的内容加以辩证地吸收，从而使后来的思想理论同此前的思想理论一脉相承。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则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那些属于个性、特殊性的内容，即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那些内容，根据社会历史情况的变化、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巨大进步加以改变，赋予新的“民族化和当代化”特点，产生新的个性、特殊性，与继承下来的共性内容重新融合，形成一种新的特质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当代化”要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永葆勃勃生机的内在动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但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要“中国化”的思路，却在五四运动之际就已出现。那时，西方的学说传入中国后，思想界在学习和效法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质的，要为中国人接受并为中国文化吸收，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便开始有了“中国化”的思路，并产生了“中国化”的概念。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而言，李大钊既是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先驱。他在1919年8月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已论述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的方法论思想；在1923年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

(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924年，恽代英在《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中说：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1927年，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要应用到各国的实际中去才行，要在自己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同年，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分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这些史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既是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做教条，这个思想和概念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虽然不是有“中国化”思路的第一人，也不是最早提出中国国情问题的领导人。但是，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对于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有成效的，却非毛泽东莫属。这得益于他的一个很大优点，即读书有很强的感悟能力，没有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习气。他从青年时代始就注重了解社会状况，投身于革命斗争后一直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一特质使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灿烂群星中很快脱颖而出。他在早年送走一批批学友“出洋”留学时，就选择留在国内，要先把自己的国家了解清楚——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他在初次读《共产党宣言》时，就初步地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即阶级斗争。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讲道：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他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1921年7月参与建党到1930年夏建立中央苏区的10年间，他在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特别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转战赣南闽西创立中央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实际有了深入了解。这对于他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具有重要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确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

想路线”。这样，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当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发展比较严重时，毛泽东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已渐形成。

也要指出，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有密切关系。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等文献指出：鉴于共产国际数十个支部所在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要共产国际对所有支部“就一切问题实行领导”已不可能，必须改变过去由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今后，各国支部的“日常领导集中于各国支部本身”，决定任何问题“都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共产国际一般避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部组织事务，也“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也不可以机械模仿，因袭抄写”。共产国际只帮助各国党学会把共产国际的路线“灵活地和具体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特别环境中去”。各国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下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精神，中共中央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获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会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将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的倾向。当时，党的实际总书记张闻天不断强调贯彻共产国际七大和瓦窑堡会议精神，1936年3月在政治局内提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

从1936年冬至1937年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中，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着重阐明了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为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在《实践论》中，他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批判了思想落后或超越实际的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在《矛盾论》中，他着重阐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强调对于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这些思想为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作了重要理